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

——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 致远讲席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比较文学中心, 北京 100732)

**摘要:** 欧洲启蒙运动以来, 知识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19 世纪“世界文学”理念与 20 世纪“文学人类学”理念相继应运而生。二者之间的变迁既是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的变迁, 也昭示着封闭的民族文学时代的文学观到后人类学时代的文学观之转型。人类学给 20 世纪思想的最重要献礼不在于这门学科的知识积累本身, 而在于文化多样性的自觉意识给当今人类所带来的再一次思想启蒙作用。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从人类学研究拓展到文学及人文学科创新实践的过程, 正在改变殖民时代遗留在学术与教育制度中的残余势力, 开启全新的文学观与批评伦理。中国学者对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的诉求,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替代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老话语, 取决于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普世性建构及其可操作的推广应用潜力。

**关键词:** 人类学转向; 世界文学; 文学人类学; 文化多样性自觉

**Abstrac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in Europe,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has accelerated.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concept of “Ethnic Literature” or “literary anthropology” in the 20th — century emerged successively.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concepts not only means the change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ost-colonial era, but also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aspect of literature from a closed tim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to the Post-Anthropology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the 20th century is not the discipline of knowledge itself, but rather the glob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e diversity which plays a role of re-enlightenment. The extending of the idea of cultural diversity fro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studies to literary writing as well as the innovative new practices in humanities is rapidly changing the colonial era remnants in the academic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opening a brand-new view relating literature and the ethics in criticism. In what sense could Chinese scholars' appeal on the emerging of a cross-disciplinary “literary anthropology” replace the old term “world literature” which rooted in Euro-centrism is dependent 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literature theory and its potential for operation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literary anthropology; cultural diversity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1)-04-0001-9

## 一、“人类学转向”问题由来

本文是近3年来的系列论文第3篇。其一为《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人类学转向》(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2009年春曾作为研究生教材在台湾中兴大学开课讲授,修订后成为作者的《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二章“20世纪文学学科的‘人类学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86页);其二为2010年6月29日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南宁)的主题报告,后分为两部分发表:《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7期),《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为什么反复地追踪和探讨人类学转向的理论问题?主要原因是从帝国主义的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当下现实,使得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和人文学术整体地面临着观念和话语转换的迫切需求。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跟随欧美主流学者重提“世界文学”的老话题。

近年来,伴随着本土文化自觉的升温过程,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面临着新的学术变化,从原来的比较文学之跨学科研究,演变为受到国家扶持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标志有三: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编的全国研究生重点教材系列中纳入了《文学人类学教程》,使得这门新课程和原有的比较文学课程一起进入了大陆和台湾高校的研究生教学。它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补充和深化的本土案例,也给建国以来基本延续殖民时代学术范式的“文学概论”一类教科书提出了一种替代和补充的方案。二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在2010年第一次向基础理论方面开放,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集体申报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获准立项,成为语言文学学科首次重点扶持的新兴交叉学科,发挥着为中文专业和外文专业教学体制改革的探索性示范作用。三是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相继成立文学人类学的实体机构,如2008年兰州大学成立文艺人类学研究所;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文学人类学中心;2011年重庆文理学院成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重庆研究中心,由副校长出任中心主任,希望将巴蜀地区多民族活态文学资源纳入高校文科改革的试点。迄今为止,中国4个直辖市中已经有3个设立了文学人类学的实体机构,这对于拓展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推进人文学科“眼光向下的

革命”,重视和发掘各地各民族的地方性本土资源,引领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和研究创新,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关于本土文学和文化资源的再认识,传统的中文学科局限于殖民时代的西方中心话语宰制,其内容和范式都显得难以适应,严重脱离现实的变化和需求,特别是无法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事业对学院派专业调整的强烈需求,都期待整个中文学科的内容和教学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此外,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现有全国56个民族的注册会员8000多人)将在2011年设立学术年会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将和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中国民协展开深度学术协作与互动。特别是民间文学专业在学科调整中被合并到民俗学(隶属于社会学),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学面临逐渐萎缩乃至被取消的危机,比较文学和文学人类学如何自觉地承担起整合原有的民间文学专业和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打通任务,亟需建构一种新的包容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替代过去的文本中心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忽略多族群互动的文学史观;希望重建后殖民时代的学术伦理:既能兼顾书面小传统和口传大传统,又能兼顾占据中心地位的贵族化文学典范和各种边缘化的他者文学活态。在这方面,以研究原住民无文字社会而著称的人类学,恰好能够提供成熟的文化理论、学术伦理及研究方法之借鉴。

## 二、从“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到“文学人类学” ——学术范式与学术伦理的变革

从学术史看,比较文学从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发挥着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学专业走出民族国家界限的拓展创新作用。在比较文学学科成立之前,歌德和马克思分别提到与民族国家文学相对的“世界文学”观;而比较文学学者继而提出“总体文学”观。20世纪后期以来,比较文学不断面临并克服各种“危机”,如今再度面临着一场学术范式和学术伦理的变革。这是怎样的变革呢?简言之,是殖民时代即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伦理,向后人类学时代(后殖民时代)、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伦理转换。对于正在建构之中的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可以通过以下两个范例再加以说明。

第一个案例是在1980年代编写全景式的人类学视野之文学读本的书

术尝试:198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卢森堡夫妇合编的《全景文学:通向民族志诗学的话语范围》<sup>①</sup>一书。该书从来没有引起过我国学界的注意,因为多数人还沉睡在西方殖民时代的文学观中,没有获得文化自觉意识。《全景文学》分为五部分,收录的是人类学家的论文和各地原住民的口头文学的英译选段。第一部分题为“早期动向”,收编“通向民族志诗学”的学术先驱之论述,包括社会科学创始人维柯、赫尔德等的作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呼唤,涂尔干《论仪式与剧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节选,艾利亚德《萨满教》一书导言,斯坦利·戴蒙德《柏拉图和原始人的定义》等。第二部分是“创作”(workings),所收内容却和文人写作大相径庭,包括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对各地原住民文学创作的介绍与评述。如非洲部落民的超现实讲述及其意象世界,祖鲁族印第安人的祈祷诗歌,伊法人(Ifa)的占卜诗歌,阿伊努人的第一人称史诗等。第三、四部分是“意义”(meanings)与“作为”(doings),收录人类学家对原住民文学再发现和再阐释的代表作。如对澳洲原住民“梦幻时代”观念的解析,对美洲印第安文学的整体概观,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民的仪式剧场的描述,对丰产仪式语言的功能透视,对萨满教表演的分类等。第五部分为“当代动向”,收录特纳等著名人类学者关于“民族志诗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论述,也包括主编者杰洛米·卢森堡关于印第安人口语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变异问题讨论。笔者曾提示:“如果将这部书的内容和《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所描述的19世纪‘世界文学’观相对照,对于什么是文学人类学,以及为什么要倡导文学人类学的问题,就会有很好的自我解答之思考。”[1]在这里,需要辨识的是,无论是卢森堡夫妇的术语“民族志诗学”,还是更多学人使用过的术语“文学人类学”,都涵盖着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两重意义。而就审视文学作品的国家的或民族的传统视野而言,民族志的即族群的新视野将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老的诗学问题是追问“什么是文学性”,新的民族志诗学的问题是追问“世界上有多少族群和多少种文学性”,以及“谁的文学性”能够充当人类文学的标准?以西方帝国列强的文学性标准作为人类文学性标准的老做法,还会延续下去吗?

对卢森堡夫妇的民族志诗学建构,美国学者埃里克·齐菲兹(Eric Cheyfitz)的《帝国主义诗学》一书(199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回应,他要求清算西方中心主义文学观的“帝国主义诗学”本质,揭露了西方所

<sup>①</sup> Jerome Rothenberg and Diane Rothenberg ed., *Symposium of the Whole. A Range of Discourse toward an Ethnopoe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谓的经典作品中潜含的殖民色彩和帝国偏见,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美国小说《人猿泰山》。在《帝国主义诗学》中,世界主义的文学观念充当殖民话语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中之工具的情况,得到了一次理论上的清算。而引导这种理论批判的学科,无疑就是驱动整个后殖民主义运动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内部对本学科的殖民色彩和充当西方文化寓言之作用的自我批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直接秉承这种人类学的批判,给齐菲兹的讨论带来重要借鉴,如格林布莱特的莎士比亚研究。齐菲兹所强调的主题是,欧洲殖民化过程在美洲的展开,如何体现在文学与翻译方面。他表明自己的立场说:“和蒙田一样,我写作本书不是为了理解美洲印第安文化,而是为了批判我自己文化的暴力,特别是我自己的语言的暴力。”[2: XV]对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卢森堡夫妇和齐菲兹的这种范式创新与自我批判精神,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在中国传统中,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帝国诗学范式的暴力作用,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大汉族主义不应只是少数民族立场的批评对象,也应成为汉族自己的自我批判对象。

第二个案例是来自比较文学阵营的新探索:凯瑟琳·杜宁(Katherine Durmin)的新作《原住民文学与可比较性》一文<sup>①</sup>。杜宁指出,比较文学的学科焦点转移,体现在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报告《多元时代的比较文学》中,此后的比较文学在抗衡国家主义范式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在国家主义话语压制下被长期忽略的原住民文学的可比性,正在得到日益增长的关注和重视。以加拿大比较文学为例,昔日的研究被法—英文化范式所统治,而今日的认识体现在“五部分构成”的新文化范式划分上,即加拿大文学是由法国人、英国人、少数族裔及因纽特人共同组成的。“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在共享地理空间和历史的基础上对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的文本进行比较。”参照这些新情况,中国比较文学复兴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疑虑“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能否算作比较文学”,可以宣告打消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未来的一个关注焦点。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将不再被看作是个别学者的专业兴趣,而被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时代趋势。

当下,和文学人类学一同出现并方兴未艾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有:语言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等。几乎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新老领域都在和文化人类学发生学科交叉和重构。这种普遍现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学转向”是一场比“语言学转向”

<sup>①</sup> 中译本刊于《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11年第1期,张焯译,第62-66页。

更加重要的国际学术发展趋势。因为跨文化认识和身份认同,在“全球地方化”(glocalism,指全球化与地方化两种趋势的互动)的现实中成为大家全都无法回避的关键词。

本文所说的人类学(anthropology),其全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这一门新兴学科几乎与比较文学学科是同步诞生和发展的。它给20世纪思想的最重要献礼不在于人类学的知识积累本身,而在于以各地原住民研究为基础的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自觉意识,正在给当代人类带来又一次思想启蒙。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每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将带来比较文学视域的方向性变化,从外向型的关注“文学的国际贸易”问题,到同时兼顾外向和内向的问题。关注中国文学内部多样性问题,必须面对行政手段划分的56民族与实际存在的数以百计的族群识别之间的巨大张力(如行政划分为台湾高山族的一族,如今已经重新识别为排湾、布农、赛夏、邹族、太鲁阁等14族<sup>①</sup>)。西学东渐以来编纂了数百种“中国文学史”的几代学者们,基本上被文本中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文化观所笼罩,尚未觉悟到以族群为单位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多样性现实的必要性。换汤不换药的“重写文学史”已经实践了几十年,在殖民时代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伦理不加改变的条件下,很难出现新人耳目的学术变革。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写的序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34]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需要建构不同于以往学科的内容、学术伦理和研究方法,当然不能全盘照搬和沿用殖民时代遗留的老术语。像“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在逻辑上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无法真正包含全球数以千计的族群文学的丰富内涵。而19世纪德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说中本来就含有的全人类意识问题,需要联系康德的哲学人类学、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观,以及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念,才能得到贯通性的还原理解。如今尽管有人主张提出改造老术语的方案,如提倡“复数化”理解的“世界文学”<sup>②</sup>等,但窃以为与其因袭前人,不如弃旧图新,以族群文学或文学人类学的新术语系统来表达后殖民时代的新文学观。

---

① 参看巴苏亚·博伊哲努(浦忠成):《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台北:里仁书局,2009年。

② 丁国旗选编:《全球化与复数的“世界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 三、什么是文学：从荷马到“活的荷马”

民族国家是近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它究竟是现实的实体还是想象的共同体？目前学界的争论尚在继续。民族国家的现代偏见和成见早就成为束缚人文学者最严重的观念牢房。相对而言，比较文学学者是率先冲破这座牢房的先驱者。然而，外在的国界的束缚容易突破，内在的观念束缚却依然潜藏在比较研究者的头脑中。文学人类学借助于“族群”（ethnic groups）和“文化认同”（identity）等新的专业术语，将更加自觉地地质疑各种现代偏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关键问题重新发问：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西方文学？什么是中国文学？以下分别用两个案例来说明，文学人类学所倡导的学术伦理是怎样引导研究者重新认识文化内部多样性问题的？这样的重新认识具有怎样的范式变革意义？

#### 1. 什么是西方文学？——荷马：西方作者或东方歌者？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场景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特洛伊神灵能够降灾给希腊联军？阿波罗究竟是哪个族群的本尊神？当代比较神话学已经证明阿波罗这个名字出自小亚细亚语，意为“门户”，原为家神。在迈锡尼时期（公元前第二千纪）传入希腊，后来被希腊人整编到奥林匹亚神系。<sup>①</sup> 换言之，被误解为希腊神灵的阿波罗，本来就不属于西方世界，后来才被同化到西方世界中去，和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相混同。<sup>②</sup> 阿波罗的真实身份自然会引出荷马本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在西方的希腊入侵者和东方的特洛伊城守护者之间，他的同情究竟在哪一边？

传统的成见奉荷马为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鼻祖，将荷马史诗视为文学史上最初始的典范式作品。从“族群”和“口头传统”这两个人类学视角去看，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荷马出生地为爱奥尼亚，属于亚洲地区。作为盲人，荷马毫无读写能力，与后世所谓作家、作者差别甚大。严格地讲，他是一位游吟歌手。两大希腊史诗只是荷马众多的讲唱歌诗中被人用希腊文记录下来的一小部分。与荷马文学最密切相连的那个深远的大传统，直到今日才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现而重见天日，可用“四级跳”来概括：希腊文明背后是迈锡尼文明，迈锡尼背后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文明，而克里特的米诺文明背后则是包括埃及和苏美尔、巴比伦、腓尼基在内

① 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辞典》，黄鸿森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页。

② 参见 Jacquetta Hawkes. *Man and the Su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186.

的地中海文明。

从受到人类学影响的法国新史学代表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到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教授南诺·马瑞那托斯(Nanno Marinatos)的新著《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sup>①</sup>,已经清晰呈现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轮廓。从宗教和文化背景看,克里特与地中海沿岸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叙利亚、黎凡特地区与埃及,均为地中海文化共同体组成部分。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的克里特文明与地中海沿岸地区密切相联,拥有许多相同的文化因素。因此,考察克里特的米诺王权神话,不宜只从西方视角出发,而宜采用跨文化视角,将其纳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中加以阐释。现存的书写资料极为有限,但可以利用克里特黄金戒指上的图像,从视觉人类学和神话图像学入手,解读和重构其具体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将此类新的文化文本研究方法归结为四重证据法,正在形成独特的立体阐释文化的新范式。<sup>②</sup>

对西方文学开端代表作的文学人类学审视,表明原有的以西方地理观念为标准的东西方划分及民族国家划分,怎样长期发挥着束缚思想和遮蔽真相的副作用。以族群为单位的重新认识,将打开一个我们以前所未知的新世界。这就是研究范式变革的意义所在。当代的古希腊神话研究专家、法国神话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迪廷(Marcel Detienne)在其新著《希腊人与我们:古希腊的比较人类学》中提出,在古希腊学研究中,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科学”研究范式,与人类学的比较主义新研究范式之间存在已久的鸿沟,正在面临被填平和弥合的机遇。我们以往熟知的希腊文明,其背后的文化多样性情况,正在得到学界的重新认识。这种新研究范式的特色就在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密切合作与互动配合。<sup>③</sup>既然西方文学的开端研究需要比较人类学的参与,那么情况同样复杂的中国文学之开启,又将面临怎样的视野转换呢?

## 2. 什么是中国文学?——嘎藏智化:活的荷马?

2005年夏,笔者和兰州大学的程金城教授到甘肃夏河县田野作业时,采访了安多藏族民间讲唱艺人嘎藏智化。他文化程度达不到小学毕业,但他口头传承的大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当地广播电台常年播出,录音总长

<sup>①</sup> Nanno Marinatos. *Minoan Kingship and the Solar Godd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sup>②</sup> 参看拙著《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九章,第十章。

<sup>③</sup> 参见 Marcel Detienne. *The Greeks and Us: A Comparative Anthropology of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7, pp. 8-10.



达2800小时,折合诗行超过100万行,是荷马《伊里亚特》1万多行的近百倍!口头传承文学的记忆和叙事能量、想象力与语言传播问题,都足以让当今的文学理论家瞠目结舌。更重要的启示在于,这位民间艺人讲唱的语境带有宗教信仰背景和萨满治疗的作用,由此引出文学人类学的文艺功能新认识,要求重新理解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提示的诗歌灵感起源于迷狂状态的古老难题。

面对这位“活着的荷马”,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处在集体失语状态。在嘎藏智化的超常规记忆和讲唱叙事能力面前,文本中心主义制约下的中国文学史老问题“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大史诗”,顿时变成一个伪命题。

美国汉学家柯文受萨义德《东方学》影响,在20多年前著有《在中国发现历史》大著。今日的文学人类学在中国面对的新问题是:“何谓中国?”“在中国发现谁的历史,谁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这样被架空的理念标签背后,有多少未知的文学等待着研究者去重新探索?就在新世纪的2010年,云贵高原上还传来新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消息。这些事实让研究者不得不反思“什么是中国文学”之类根本性的发问。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人面鸟身神的奇特形象和成吨的祭礼用象牙,昭示着一个与中原王朝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神话世界。汗牛充栋的汉语史书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神秘的失落文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黄金权杖,自然让人联想到这是东亚的中原文明所没有、而归属于西亚的地中海文明的标志性圣物。以四重证据法为独特方法论的文学人类学,正在尝试解读此类“在中国发现谁的历史”之难题。

####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 “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J]. 当代外语研究, 2010(7).
- [2] Eric Cheyfitz. Introduction[A].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恩格斯. 资本论·序[A]. 马克思. 资本论[M]. 马恩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